

中国经济迈向全球化战略发展的重大时空刻度

■ 管益忻 本报主编

2014 年的 11 月，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月份。我国连续参与主办了 APEC 会议、中国东盟 10+3 峰会和 G20 峰会。这三场引世人高度关注的关乎全球的会议可以说是习总书记主政以来外交理念最为全面的一次展示，是我国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发展、资本运作全球化拓展的一个组合性安排。此次北京 APEC 会议成功地分化了、淡化了以美国为主导的 PTT 对我们全球化发展的压力。在破解 PTT 的同时，中国启动了东盟自贸区，又间接推动着此前就开启的中日韩自贸区，更兼之有此次提出的亚太自贸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全球化战略运作，这一战略中蕴含了“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不仅如此，这种“和而不同”的运筹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对外或是对内的常规对策和布局上的“新常态”。当然，中美对“和而不同”的认定是不同的，美国更倾向于将“不同”放在前面，而将“和”放在后面。中国则与之相反。将“和”放在前面，且为总纲领。中国将在“和而不同”的思路指导下和平崛起。

必须明了，经济发展不是孤立的。经济运行发展系于政治、系于文化，也系于外交，系于军事。2014 年 11 月是中国经济迈向全球化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时空节点，因此可说，2014 年 11 月份是中国全方位、大视角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时间刻度，是走向大 G(大集团)化元年。其重大战略意义之一是它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从产品全球化为主向资本全球化为主过渡，外向型依存度更注重海外投资。之二是我们从仅仅为规则的遵守者变为规则的制定者；之三，这是中国第一次举起自己的旗帜。在世界历史上，过去叫做“欧洲中心论”，或者“美国中心论”，如今第一次开始迈步向“中国参与中心论”演进，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现在国际上都认为中国正在成引领的力量，当然我们自己更应该实事求是、保持低姿态。之四，要高度重视 G(大集团)化的战略意义，欧佩克仅 12 个国家组成，只占世界 1/3 石油产量，只因“一个声音”讲话，“高音喇叭”，大搞减产，就使国际油价大降。之五，这是新的货币体系，资本体系较量的开始，金砖银



经济运行发展系于政治、系于文化，也系于外交，系于军事。2014 年 11 月是中国
经济迈向全球化的一个重大的
战略时空节点，因此可说，
2014 年 11 月份是中国全方
位、大视角走向世界的一个重
要时间刻度，是走向大 G(大
集团)化元年。

行，亚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形成正在改变着世界金融格局。

最后，不管西方世界设计了一个如何美妙的蓝图，当今的世界确实已经是两种资本体系的较量，传统的两个阵营不存在了。但是中国实际上是在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特色的资本体系。无论是 APEC，还是东盟 10+3，还是我们与欧洲的联系，其实都是一种资本实力的较量。

另外，不管是在气候谈判，还是在其他有关国际议题上，美国开始比较认真地聆听来自中国方面的建议了。两国的合作模式正在

或直接或间接地走向融合，尤其是关乎地区、世界发展的大事，实现某种意义的“华盛顿共识”向“北京共识”靠拢。在投资方面。今年 10 月底中国首次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这是西方世界难以想象的。虽然我们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这种成绩是外界不得不承认的。

我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更应该温故而知新，回过头来梳理自己的产业资本发展史，之后再倒回去研究，对比西方的产业资本发展史，以洞察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比较看来，美国经济的先天优势非常好，当时建国时的 13 个州就相当于今天的“特区”。正如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说，美国的崛起就是靠这 13 个州崛起的。英国人统治时期，对于这 13 个州没有实行“原料低价进、产品高价出”，而是平价政策，还给予很多优惠。其实，中国封建社会时也有特区，比如山西运城的盐场，宋朝财政十分困难的时候，曾派包拯去整顿。此地盐场缴税额占到朝廷财政收入 1/3。而且其中运用了股份制，当然这与西方的股份制不一样。山西后来首先出现票号，也是因为它有了产业基础，才可能有金融资本的出现。

(此稿系编辑部根据管益忻教授在华夏时报组织的“华夏评论”的发言整理而成)

根推测，新税收将属于“核定利润税”，而非企业税，因此将可以回避双重税收协定引发的的问题。他认为，财政部将核定那些因使用费安排或者缺乏应纳税存在，而得以在英国避税的利润。

他表示：“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税收……它具有巨大的震慑作用，将阻止人为避税。问题是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他将此举称为一个“核选项”，旨在促使企业调整结构以在英国缴纳更多税赋。他表示：“那些打擦边球的企业会感到非常担忧。”

(FT 中文网)

货币政策不应担结构调整之责

■ 沈建光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有关中国央行降息的讨论，近期占据了中国内外媒体头条。对此，大部分专业人士都给予积极的评论，甚至可以说好评如潮。对于此次央行降息的意义与逻辑，笔者与多位市场人士已经给出了充分的讨论，总体来看分歧不大：鉴于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弱增长、低通胀、高资金成本的阶段，降息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不应让人感到意外。

然而，笔者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如此专业化的工具使用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和阻力，也就是降息为什么这么难？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经济条件满足，降息推出按理说应该是顺理成章，各方并不应感到意外，反而早应有所预期。但中国央行的此次降息却历尽波折，政策落地之前后都一直伴随着全民热议，且不少讨论甚至远超出货币政策工具本身，确属罕见。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暗含着一种困局，即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已被寄予了过高期待，或已经变得非常“全能化”和“政治化”。换言之，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之下，货币政策已经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重负。考虑到近一年来，提及降准降息等常规性的使用往往遭到非议、央行避开传统货币绕道创新工具、甚至连文字上“强刺激”与“微刺激”都被大量过度解读等，也都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这样一种困境。

归根溯源，造成这一困境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对于“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反思有关。当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一度面临硬着陆局面，而后通过“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短短一季度，中国经济便扭转了下滑态势，实现增长在全球率先反弹。如今来看，上述经济刺激产生的不少后遗症让人反思，包括这几年的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及连带的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等，都与“四万亿”不无关联。

笔者也曾在早前 FT 中文网专栏文章《反思“四万亿”恐惧症》专门论述。笔者认为，总结“四万亿”一揽子刺激的教训是必要的，但同时也不宜矫枉过正。“四万亿”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 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包括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以及产业政策存在不少弊端，从而造成过度刺激的问题。实际上，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形势采取逆周期措施已经较多理论和实践经验，本身着实难言刺激。

如此看来，避免重走老路，真正需要做的并非是否采取政策，而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如何避免过度刺激？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尽管如此，笔者发现，政策在过去一段时间落实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即结构性调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整的重任很大一部分落到了货币政策的肩 上。比如早前大量使用创新工具,通过定向支持的办法注入资金，常规性工具却被束之高阁便是佐证。

对此，笔者深感困惑：货币政策能否承担结构性调整之责？早在 FT 中文网专栏文章《中国货币政策新框架新辩》中，笔者便提出了这个问题。不难发现，中国央行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央行，也是最不易的央行，货币政策承担了六项重大责任，不仅包括低通胀、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创造适度的就业机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还要承担金融稳定与改革发展的任务，这对海外央行来讲，其实是绝无仅有的。

实际上，从海外运行历史悠久的中央银行经验来看，一般以单一目标或至多两项目标。从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要想让中央银行在过多目标之间左右逢源，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一角度来讲，笔者认为早前一段时间中国央行采取的诸多创新工具其 实便是货币政策承担改革发展任务下，面对结构性矛盾所采取的次优选择，只应作为过度性措施，不应纳入长期框架内。

退一步而言，即便我们想让货币政策承担结构调整重任，效果又是怎么呢？事实说明，大量不透明的定向措施效果往往事与愿违，比如早前定向资金难以流入定向领域，定向价格与市场定价差距较大，甚至有碍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形成，有悖于利率市场化的初衷等等。

更严重的是，笔者担忧，货币政策过多承担结构性改革之责有固化结构性矛盾的风险。因此，加强配套改革仍然是唯一选择。实际上，我们不难发现，造成当前货币政策传导不畅，资金运用低效以及金融风险加大等很大程度上与配套改革进展缓慢有关。例如，在《深化改革协调性至关重要》一文中，笔者曾提到，政府行为对资金投向的过度干预、以及国企缺乏整合机制，处于资金获得优势方都是造成当前困境难脱干系。因此，让货币政策回归常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由其他配套改革加速推进来应对或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从这个角度而言，此次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降息举措确实不易，不仅对于改善基本面与资金高成本有利，更标志着央行政策操作从过度依靠非公开透明的定向操作转向公开透明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和法定准备金。

当然，若想真正吸取过度刺激的教训以及避免经济金融风险，理顺当前央行面临的困境，缓解定向货币政策难以承受之重，更为关键的是未来增强央行独立性，专注于控制通胀及就业，以及金融稳定。除此之外，则需要更高层面协调推进改革，特别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政府机制改革是重中之重。

本报第二届“（2014）中国经济学人”评选启动

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报拟在“2013·中国经济学人”评选活动基础上举办第二届“(2014)中国经济学人”评选,自 2014 年 11 月 2 日起正式启动。 参评者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其理论具有原创性、实战性、时效性、前瞻性和首发性;在本报至少发表过一篇论文;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欢迎具备条件者踊跃参评。

经济学家周报 “2014·经济学人评选”基本规则

- 1、成为“经济学人”的基本条件是：
其一，原创能力强，学术水平高；其二，理论实战性强，甚具可操作性；其三，应用时效性强，社会影响力广泛而深远。
- 2、本评选系整体评价个别“经济学人”，而不只是哪一（几）部（篇）论著或哪一（几）个别观点、论点。
- 3、关照各个学术流派，各个领域。学者：老、中、小兼顾，文论：长、中、短皆宜。
- 4、不搞“终身制”，一年一届；随时

新送参评（参考）作品请发至本报投稿信箱，来稿请注明“参评参考作品”。 邮寄作品请寄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46 号东区一号楼 113 室，邮编 100081。参评稿收稿截止日期（以发送日期和邮戳日期为准）：2015 年 1 月 15 日。

经济学家周报专家委员会

2014.11.2

英国将对跨国企业征收“谷歌税”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未来 5 年计划针对跨国公司征收逾 10 亿英镑的“转移利润税”，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咨询师们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一税收将如何实施。作为秋季预算报告的一部分，奥斯本宣布了这一举措，其目的是“确保大型跨国企业承担合理税赋比例”。

这项税收被普遍称作“谷歌税”，奥斯本认为开征该税将打击“全球一些利用复杂结构避税的大型企业（包括科技企业）”。

顾问们对此举是否与英国的双重税收协定一致提出质疑，该举措打算到 2019/2020 年度，总共筹集 14 亿英镑税收。一家领先科技公司的高管表示，科技行业不太可能对抗这一举措，但他认为此举属“单边行动”，不会符合经合组织(OECD)仍在继续的对国际税收改革的考察。他表示：“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税收专家怎么看……但制定法律的是政治人士，我们会遵从他们的决定。”

专业服务机构毕马威(KPMG)的克里斯?摩

草案增加了对重点区域和燃煤、工业、机动车、扬尘等重点领域开展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和区域联防联控的专门规定,明确了对无证、超标排放和监测数据作假等行为的处罚措施。

孟子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意思是法令不能够自行发生效力。光有法令,政策,没有强大执行力,治霾依然是一句空话。但在当前,一些地方官员消极应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作为监管部门的环保部门,更是没有尽到监管责任。这就是尽管当前环境治理措施那么多,但污染依然严重的症结所在。

治霾先要治官,特别是要治环保部门无所作为、不敢担责的庸官。我们看到,中央巡视组进驻环保部,说明高层已认识提升监管责任和打造执行力的紧迫性。号称“史上最严环保法”即将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首次给予了环境监察部门明确的法律地位。而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也下发文件,要求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责。环保部门只有改变执行力软弱的形象,真正实施“铁腕治污”加“铁规治污”,APEC 蓝一定会常来不走。

(FT 中文网)

留住“APEC 蓝”，先要治环保庸官

“APEC 蓝”成为中国当前使用率最高的网络语言之一。在过去的二周里，饱受雾霾肆虐的中国北方居民，一遍遍怀念刚刚逝去的 APEC 蓝。尽管被称作“治霾大使”的北风随即到来吹散雾霾，但毫无悬念的是，雾霾依然很快会再次光临。“APEC 蓝”告诉公众，雾霾的肆虐是可以驯服的，要的是有雷霆万钧之势的强大执行力。而要有执行力，就先要治环保部门不作为的庸官。

在过去几年里，以京津冀为主的中国华北地区深受雾霾的侵扰，并向华东地区大规模扩散。早在 2010 年 9 月，美国宇航局公布的一张全球污染颗粒 PM2.5 浓度地图就显示，中国华北、华东地区是 PM2.5 污染的重灾区。2013 年以来连续两年，环保部都在每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承认我国环境质量状况形势依然严峻。据中国环保部的数据显示，全国 74 个新标准监测实施第一阶段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仅为 4.1%。

对于 PM2.5 的认识乃至采取措施上，中国环保部门的反应显然慢了不少一拍。3 年前，当公众纷纷自测 PM2.5，甚至广泛以美国

大使馆的数据为参考时，中国环保部还在义正词严地抨击别国发布检测数据属于干涉内政。在 2012 年世界环境日高层论坛上，中国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甚至告诫大家，不要听到 PM2.5 就“谈虎色变”，“希望大家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暖风吹得游人醉，莫把中国当美国”。

据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2013 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 52 年来之最，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 13 地均创下“历史记录”。2013 年 1 月 11 日的监测数据显示，中国各地的 PM2.5 都已达到极值：北京 950，武汉 968，石家庄 898，承德 890，天津 688。环保部近日刚刚发布 2014 年 10 月份中国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其中，北京市 10 月份共发生四次重污染过程，其中出现重度污染 6 天，严重污染 4 天。与去年同期相比，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增加 5 天。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一切仍在恶化趋势之中。

从中央政府到民众，中国对雾霾的治理取得了上下一致的高度认同。中国总理李克强 11 月 26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